

立下愚公移山志 向贫困发起总攻

——各地干部群众热议习近平总书记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振奋人心，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定能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写下光辉篇章。

“这是载入人类史册的减贫成就，证明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河北省兴隆县扶贫办副主任庄云飞对说，河北兴隆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石质深山区，全县290个行政村有280个村是革命老区，基础设施落后，生活条件艰苦。近年来，国家加大扶贫资金的投入，一举摘掉了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帽子。

习总书记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增强了基层干部推动扶贫开发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

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蒋家柏告诉记者，广西目前仍有538万贫困人口，在全国排第4位。未来5年，扶贫部门将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

决战决胜的担当，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

河北省广宗县核桃园乡董里集村党支部书记张建增告诉记者，7年前村里只

有个“穷壳子”，种地靠天收，交通条件也十分差。现在在扶贫政策的引导下，产业扶贫和基础设施建设上了新台阶。

各地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立下愚公移山志，向贫困发起总攻，坚决打赢这场事关民族命运的脱贫攻坚战。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三问京津冀雾霾

风来了，霾散了。持续五日深陷“霾”伏的京津冀居民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不过，关于这次重霾成因的追问不该随着“霾消云散”而终止。

北京局地PM2.5峰值浓度逼近1000微克/立方米，京津冀至关中原多地PM2.5爆表……重霾来袭，北京“红色预警”为何闲置？如此严重的雾霾，污染源究竟从哪来？多年强力治霾，效果却如此“苍白”，雾霾究竟是天灾，还是有人为因素影响？且听环保专家如何作答。

追问一 北京“红色预警”为何闲置？

11月30日，北京遭遇重“霾伏”的第四天，北京多处出现“爆表”现象，一检测点PM2.5浓度一度高达945微克/立方米，浓度逼近1952年夺去几千人生命的伦敦烟雾事件。然而，北京市自29日发布今年首次橙色预警后再无响应，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苦等不来。

“红色预警”为何闲置？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说，北京市今年3月修订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对预警等级启动的条件做了改动，在上一版的基础上去除了污染程度，只考虑持续时间。按照预案，预测空气重污染将持续3天(72小时)以上才发布“红色预警”，因此，此次重污染过程还没达到“红色预警”条件。

张大伟也坦陈，预警以预测为基础，与气象预报类似，空气质量预测与现实难免存在出入。“我们最初预测27、28日重污染天气会持续48小时，到29日有所缓解，实际上29日下午PM2.5浓度确实大幅下降，一度落到四级中度污染，但由于前期PM2.5浓度太高，污染物消减的效果不好，导致29至30日再次出现重度污染。”

张大伟表示，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已改版3次，经过这次空气重污染过程，有可能未来会做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将污染程度、持续时间等一并考虑进来，作为预警启动的前提条件。

对于可能给百姓健康、生活带来重大危害的雾霾，如何提高空气质量预测准确性，减少误判？应急预案如何更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着想？预警启动标准的设计能否更加科学？这些都值得有关部门深思。

追问二 如此严重的雾霾，污染源从哪来？

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这场可怕雾霾的蔓延过程：11月26日夜間开始，雾霾肇始；27日至29日，范围不断扩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70个城市中达到重度及以上污染的城市数量从9个增加到23个、30个，至30日，已增加至37个。重霾影响范围超过50万平方公里，接近法国的国土面积。

如此大范围的重污染，成因是什么？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极端不利的气象条件是此次雾霾形成的重要原因。2015年为有历史统计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进入11月以来，华北地区遭遇多次强降雪天气，降雪消融导致地面湿度接近饱和，温度降低，而中层大气同期存在显著回暖情况，导致华北地区大范围处于高湿度、低风速、强逆温的极端不利气象条件，污染持续积累，造成本次大范围的重区域性污染。

此外，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认为，燃煤、机动车等仍是主要的污染源排放因素。进入采暖期后，燃煤污染排放明显增加，特别是前期的降雪降温过程，导致区域燃煤采暖消耗量大幅增加。

同时，静稳低能见度天气条件下，道路拥堵加剧，燃油效率降低，机动车污染排放也显著增加。持续的高温静稳气象条件，利于气态污染物向颗粒物转化以及颗粒物吸湿增长，这些都加重了PM2.5的浓度水平。

追问三 是天灾，还是人祸？

北京市财政局2014年公布，计划5年统筹落实资金近500亿元，专项用于防治大气污染。近年来，各级政府为治霾投入的人力、财力不可谓不大，为何雾霾依然“来势汹汹”？雾霾的形成只是极端天气？有没有人为因素助推？

此次重霾发生后，环保部自11月27日起派出10个督察组到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五省市重点城市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情况和大气污染源排放情况进行督察。“从督察的情况来看，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对此次重污染天气的应急响应是比较及时的。尽管如此，督察在此过程中还是发现了很多问题。”环保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主任刘长根表示。

按照北京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橙色预警下应有2100多家企业停产限产。然而从督察结果看，部分企业应急减排方案未落实，一些工地、砂石企业没有落实停工停产要求，施工和道路扬尘问题依然存在。

天津、河北等地也存在建筑工地、管网、道路施工土石方作业不停工，水泥搅拌站未停产等问题，渣土车、重型货车道路遗撒现象时有发生。除此之外，一些区县劣质煤散烧污染也是此次督察发现的问题之一。

“从实施情况来看，各级政府在启动、会商和采取应急措施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但是落实到乡镇、街道时效果就是大打折扣。”刘长根表示，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不能形成合力，管理粗放和缺陷导致了空气应急预案的效果不能达到预期。

“只有将预定措施执行到位，应急预案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与健康创新基地首席科学家张金良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生活源的管控力度也需要进一步加大。

“地铁口周边的露天烧烤摊位，不仅在这种重污染天气下不应该存在，在平时也应该取缔。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以及重污染天气的应急工作，还有很多可以提升的空间。”张金良表示。

痛定思痛，驱霾不能只靠风，治霾更不能靠应急。要想真正驱除人们的“心肺之患”，功夫还要下在平时。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从源头减排才是治本之策。对于每个人来说，谁都不能做看客、旁观者，少开一天车，抵制路边烧烤，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举报……相信每个人都前进一步，雾霾就会与我们远离一步。

记者崔静 杨维汉(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别让孩子陷入贫困代际传递

——我国贫困地区教育问题观察

11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国家教育经费要继续向贫困地区倾斜、向基础教育倾斜、向职业教育倾斜，帮助贫困地区改善办学条件。

提升教育水平，是扶贫攻坚一个“老难题”，不仅关系到未来五年70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更是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代际传递的一个治本之策。

近日，新华社记者记者在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山西等地采访时发现，尽管经过多年努力取得显著成效，但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仍有诸多难题，各级政府、社会各界、贫困群众还在艰难求索……

A “砸锅卖铁，也要供她们读书”

上联：家中父母吃苦受累盼捷报频传

下联：灯下学子勤学苦练求金榜题名

横批：不曾忘记

——在广西都安县高中一间教室门口，记者看到这副对联。

都安是广西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县之一，地处云贵高原南麓，到处是石头山，田土稀少，俗称“九分石头一分地”。“读书才能改变命运”，这里许多百姓都认这个理。

都安高中教师韦喜凤说，学校近40%学生是贫困生，为摆脱贫困，孩子们读书非常刻苦。去年，这所县城高中10人达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录取分数线，一本上线率超过20%，一度引发轰动，都安高中也成为广西“名校”之一。

身高不到一米六的韦红牡腼腆、寡言。不久前的段考，韦红牡全年级排第10名，班主任梁瑞权说，按现在的成绩，韦红牡肯定能考上重点大

学。但时间又到月初，她的生活费还没着落。

在都安县大兴乡国隆村，记者见到韦红牡54岁的父亲韦冠时，他正扛着锄头回家，盘算着跟谁再去借钱。家里欠下的2万多元债务，对于这个深山里的贫困户而言，无疑是一笔巨款。

走进韦冠家的木瓦房，只见几张桌子、2盏灯泡，还有乱堆着的玉米梗和木柴，全家连一台电视机都没有。家里养了10只羊、4头猪和1头牛，种了1亩多玉米。

他借的钱，全花在4个女儿读书上。“老大读高中，老二和老三读初中，老四读小学，她们光生活费每月就要1000多元。”

生活的压力，让韦冠夫妻俩喘不过气来。女儿成绩优异，是他们最大的慰藉。韦冠的右眼已视力模糊，为让孩子读书，夫妻俩省吃俭用、四处借钱，从未让一个孩子辍学。

“砸锅卖铁，也要供她们读书。孩子也争气，干完农活总看书到半

夜。”妻子蒙凤琴眼圈一红，流下泪来，可抹完眼泪，她又坚定地说，我们这辈人穷怕了，不想孩子们再穷。“最好四姐妹都能读书离开大山。”

在很多贫困地区，都有为送孩子求学而备尝辛酸的故事。在山西省吕梁市岚县、石楼县等地，就出现不少家长“陪读”现象。

43岁的郭秀林已头顶白发，石楼县龙交乡的这位农妇，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很多。为让小儿子“读书读出去”，从幼儿园开始，便下狠心将孩子送到县城，和丈夫打工并“陪读”，一家人租住在县城周边一座山坡上的民房里。

郭秀林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给小儿子做好早饭，陪他去四五里外的学校上学，然后赶到县城一家烧饼店打工，中午再跑七八里路，回去给孩子做午饭。天色将黑时，再接上儿子回“家”。

这样周而复始的艰辛生活，郭秀林已过了七年。

↑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加勉乡加坡村，孩子们在村里的教学点上课(3月25日摄)。



↑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乡合村，一名小女孩在自家门前写作业(9月25日摄)。



↑在贵州黔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龙里县洗马镇落锅村，一个女孩在黑板上写字(10月30日摄)。



↑在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兴乡骨龙小学，一名学生趴在床上复习功课(2014年6月25日摄)。(本版照片：新华社发)

B 以教育“拔穷根”仍在路上

并不是所有穷孩子都能在贫困中坚持把书读下去。

记者在西北、西南、华中集中连片贫困带走访时了解到，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很多地方教育条件与外界差距大，一些贫困生初中没毕业便外出务工。

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苏国霞介绍，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的程度都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超过50%的人只有小学以下文化程度；22.3%的家庭表示，因为缺少技能摆脱不了贫困。

湖南邵阳隆回黄荆乡，地处山区一条“干旱走廊”。“黄荆岭，石头壳，缺少水田，光棍多。”民谣这样唱到。记者见到留守女童黄春花，尽管已上小

学，但很多简单的汉字她都不会写，10以内的加减法也不会做。

她的妈妈早已离家出走，爸爸在外当保安，她由奶奶照顾。

这个寡言的孩子，在和记者近两个小时交谈时始终低着头，过好久才会答一句话，说得最长的一句，是她的理想：“快点长大，出去打工挣钱。”

春花的情况并非个例，在黄荆乡贫困家庭里，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很少。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李斌说，一旦求学条件和求学成本过高，贫困家庭难以承受，或通过教育摆脱贫困缺乏预期，很容易使贫困家庭放弃教育之路，并陷入“低人力资本投资—低就业—低收入—低人力资本投资”的贫困恶性循环。

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最近十多年来，我国大力改善贫困地区教育条件，实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全免，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超4%。近年来，营养餐工程、“改薄”工程等政策的实施，使许多山区学校焕然一新，山区优质教师资源流失现象得到一定程度遏制，贫困孩子读书开始更有盼头。

然而，城乡差距过大，能继续求学的贫困孩子比例仍很低，且随着发达地区孩子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贫困家庭子女与其差距更无形中被拉大。

即便有机会继续求学，其支出对贫困家庭仍是重负。“进村入户，房子最破、最穷的家庭，九成的可能是这家有孩子读高中或大学。”都安瑶族自治县扶贫办副主任黄若平说。